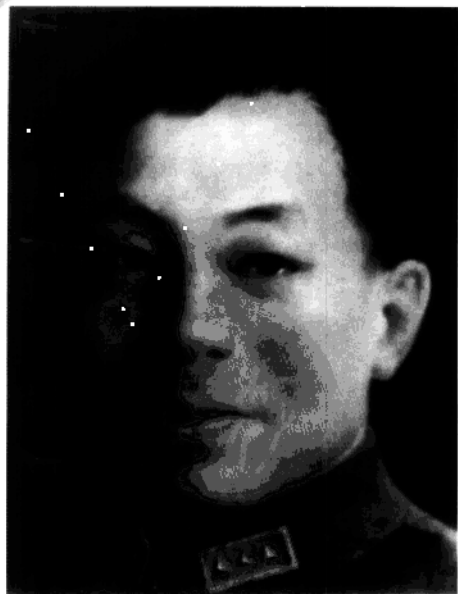




晚年时期的张学良将军



任安国军大元帅时的张作霖



1936 年时的张学良

张学良参加孙中山
雕像揭幕与蒋介石等
合影



1934年10月21日，张学良陪蒋介石游茂陵。右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傅学文、张学良、邵力子、杨永泰



青年时期的于凤至



少年时期的张学良



张学良与弟弟学铭、学普、学思、学森、学俊、学英、学铨合影



1936年10月6日，张学良、杨虎城等飞抵陕北榆林绥德视察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蒋介石、阎锡山等在洛阳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将军在九秩华诞寿宴上



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在祝寿会上



2000年3月，张学良研究会会长张德良（后左一）、秘书长周毅（左三）拜会张学良将军



百年华诞会上的张学良先生和赵一荻女士（2000年6月）



张学良（2000年6月）

序

——张学良与 20 世纪中国

张学良，1901 年 6 月 3 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诞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桑林子詹家窝堡（今属台安市）。2001 年 10 月 15 日（北京时间），在美国夏威夷逝世。张学良将军作为世纪老人，既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见证人，也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张学良将军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众多历史人物相比，其政治生涯并不长，但他以“东北易帜”、“调停中原大战”、“发动西安事变”等三次扭转中国历史走向的功勋，铸成了他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伟大爱国主义者的辉煌地位。

一、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主要成员，对军阀混战持何种态度？

有人曾提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主要成员，曾多次参与国内军阀间的混战，他对当时的军阀割据、混战持何种态度？

张学良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承父荫 20 岁便出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22 岁时，便以“镇威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的身份，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24 岁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出任奉军第三军军长率军出征，是实际上的前线总指挥。25 岁晋升为陆军中将。同年担任讨伐郭军的前线总指挥。26 岁出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进攻国民军。27 岁率军南下，对抗北伐军。

从张学良从军的经历上看，他是一个军人，同时是奉系军阀

中主要成员。但这并不出自于他个人的意愿，他不愿从军，从军后也不愿当军阀，更反对军人干政，反对军阀战争。1924年，他在北京大学欢迎大会上说：“良不过一军人，自己但知军事，他无所学。良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阀，固不仅问分内事，且干预分外诸政。”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奉系集团的主要将领，他虽有上述主张，却不能阻止奉系穷兵黩武，且还要冲杀在战争的第一线，这使他处于极端矛盾之中。为阻止战争的继续，在对抗北伐期间，他适时把握时机向其父进言罢兵息争，甚至还曾设想通过“兵谏”的方式，迫使其父张作霖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和平统一条件。最后，张作霖终于接受张学良等将领的意见，下令奉军撤回东北。

在这个时期，张学良虽还不能对中国近代社会有很深刻的认识，但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军阀混战是祸国殃民的。因此，他公开表示自己不愿为军阀，更反对军阀混战。

二、如何评价张学良的东北易帜？

关于张学良东北易帜的评价，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内地学者基本持否定态度，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仍有人认为“东北易帜有其反动的一面，也有其进步的一面”。认为东北易帜将东北“统一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国民政府，特别是后来发展成为一切听命于蒋介石的极端政策，其反动趋向更为明显”。我们认为这样评价东北易帜是不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东北易帜不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又能统一于谁？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时，应以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对东北易帜这一问题的评价，我们不能苛求张学良将东北统一到共产党人的江西革命根据地去。在当时形势下将东北统一到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正确的选择。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子继父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学良，虽然握有相当的经济、军事实力，控制东北全境，但同时也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一是如何在政治上稳定东北大局和统一内部的问题；二是如何确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三是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处理日本制造的诸多麻烦和咄咄逼人的态势。这三方面问题的核心是第二个问题，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它直接影响着东北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也是处理与日本关系的基础。处理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有三条道路可供张学良选择：其一，像南京国民政府所要求的那样，实现无条件的统一；其二，如日本关东军一向主张的那样，把东北变成一个自治地区；其三，如张宗昌等少数将领所主张的那样，倚靠日本的帮助，继续与南方作战，保住东北原来的政治、军事地位。

张学良坚持坚定的和平统一主张，并顶住各方压力，经过斗争和谈判，终于1928年12月29日，在东北降下张作霖时代的五色旗，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东北易帜，它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的结束，使得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实现了统一，尽管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统一，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东路战争是“无故挑衅，无故投降”吗？

中东路战争是由中东路争执引发。按《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东路理事会应在短期内修订《中东路章程》，但由于理事会10人中苏各占半数，议案必须有6人以上同意方能发生效力，而事关两国利益，理事都各护己方，致使任何议案均无法通过。而苏籍局长则利用旧章程赋予的权力，独揽一切，处处侵犯中方权益，双方矛盾日益尖锐。中方提出最低限度的解决办法，苏方

仍不肯接受，致使交涉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地方当局遵照南京政府“相机进行”的电令，实行武力接管中东路，引发了苏军侵犯中国的中东路战争。

1929年8月13日，苏出动兵舰两艘、陆战队300人、飞机两架，侵入我国东线松花江绥东县境，从此，中苏边界冲突不断发生。8月15日，张学良动员东北军6万人，派王树常为“防俄”第一军军长，任东路总指挥，胡毓坤为“防俄”第二军军长，任西路总指挥。

大规模军事冲突是从东线开始的，从8月13日苏军侵入绥东起，到10月24日海拉尔之战结束，前后共两个半月。最后，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中苏战争，以东北军的惨败而告结束。东北当局抱定在“不割地、不赔款、不损国权”的条件下，忍痛签字。

议定书签订后，中东路恢复原状，苏方撤军。对于此次战争，当时曾有“无故挑衅，又无故投降，辱国丧权，莫此为甚”的评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中仍有持这一观点的。我们认为这样评价缺乏具体分析，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开始推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约运动。在这一背景下，东北地方当局为争取中东路权益与苏方交涉是正常的，甚至表示强硬的态度也属正常，但不应采取武力接管的方式。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应该是：“事出有因，处置不当。”我们既要肯定张学良和东北地方当局争取中东路权益和接管中东路的动机，又要批评他们在行为上的盲目性，致使良好的爱国动机，却造成了辱国的结果。

四、怎样评价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

东北易帜，促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统一后，小规模的内战仍不断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因素仍然存在，国家统一受到严重威

胁。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全力制止内战的发生和扩大，再次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在评价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这一问题时，有一普遍看法：即在肯定中止战争、减少人民疾苦作用的同时，又认为调停中原大战“是维护了蒋介石的统治”，为“日本侵略东北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两方面的结果在不同程度上是存在的，甚至还有不利于共产党革命斗争的一面。而我们评价人物和事件，应抓其大节而论之。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如果看不到主要方面，是非曲直也就没有标准了。

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内战，这次战争为时半年多，双方投入兵力多达百余万人，死伤将士约 30 万人，给国家财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这场战争在张学良调停时，双方仍处于势均力敌状态。这场恶战如果继续打下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避免了国家和人民遭受更大的损失和苦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此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当然我们也看到，1930 年 9 月 18 日作为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个亮点太短；一年后的 9 月 18 日又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难以洗刷的污点。这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五、“九一八”东北沦陷，边疆大吏难辞其咎

有关“九一八”东北沦陷，长期以来通行的一种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造成的；最近也有人对此种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的说法是不可信的，主要根据是蒋介石没有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方针是不同的。试图说“九一八”东北沦陷的主要责任人是张学良而不是蒋介石。

我们始终认为东北沦陷的主要原因是“不抵抗主义”，因为当时日军在东北境内各种武装人员只有 26882 人，而东北军有 19 万人，去掉非战斗人员，敌我兵力对比是 1:6。如果实行抵抗，日本关东军一夜占领沈阳、4 个多月占领东北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我们仍然认为不抵抗方针是蒋介石制定的，张学良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忠实地执行了不抵抗方针，才造成了“九一八”东北沦陷的历史悲剧。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确实没有发现蒋介石发出“不抵抗”指示，但这不等于说没有制定“不抵抗”的方针。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实行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在事变发生前后又有“避免冲突”的指示，直到长城抗战前，蒋从未发出有关任何抵抗的指示。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上述作为，不是“不抵抗”方针又能作何解释呢？至于“避免冲突”与“不抵抗”的差异，“不抵抗”与“不抵抗主义”的区别，在字面上是存在的，但在实行“不抵抗”的事实面前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此，蒋介石虽然没有直接发出“不抵抗”指示，但他仍是“不抵抗”的第一责任人。但不能因为有了第一责任人而使张学良的责任有丝毫减轻，是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才使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侵占了东北。

蒋介石为什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一是蒋自“四一二”政变以来一直视共产党为主要敌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二是以为日本只是对东北有某些权益要求，对日侵略目的估计不足；三是以为国联能够和有能力强主持正义；四是认为西方列强对日独占中国不会袖手旁观。

张学良为什么会实行不抵抗政策？上述蒋介石四点中的后三点张学良都存在，尤其是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形势、目的估计不足，判断错误。1990 年 8 月，张学良在台北首次公开接受日本 NHK 采访组采访时，他针对“九一八”说“你责备我不抵抗，

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由于判断的错误，便在“避免冲突”中步步退让。同时是对东北军自身实力估计不足，他消极地吸取中东路战争的教训，认为没有全国的支持，东北军不足以对抗外敌，他最早提出全国抗战论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另外是他这个时期身体不好也影响了他个人意志的形成。

张学良在事变前执行不抵抗政策是坚定的，事变即 18 日后对不抵抗政策便逐渐动摇，转而主张抵抗。张学良此时的抵抗是在暗中进行的，表面上仍坚持依靠国联主持正义。由不抵抗转为暗中抵抗，再到公开的坚决抵抗，虽然为时已晚，但对发动全民族抗日运动和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都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有自觉实行与被动实行的不同看法，这虽然存在程度不同的判断，而实际上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实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地区的封疆大吏，“九一八”东北沦陷，他是难辞其咎的。

六、张学良之所以是“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还在打内战的局面，是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的转折点。张学良兵谏西安，再次扭转中国历史的走向，成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也有另一种观点，有人说“成也张学良，败也张学良”，甚至说他是“千古罪人”。这后者是站在狭隘的集团利益和党派利益的立场，置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我们之所以说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因为张学良有大功于国家和中华民族。

从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上看。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

盾，全国人民普遍要求抗日救亡，而蒋介石却顽固不化地坚持“剿共”内战政策，并要张学良及东北军去执行。张学良经多次力谏无效后，只有选择兵谏这一途径，其目的为了结束内战、实现全民族的共同抗日。

从张学良坚定地实行和平解决事变的行为上看。张学良判断国内政治始终是以对国家、民族、民众有利为标准的。事变前，他由于不满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并达成逼蒋共同抗日的共识。发动事变也是以逼迫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战为目的，事变发生后立即公布“八项主张”，向国人阐明这一政治观点，并约共产党派人到西安共商国是。在形势错综复杂、谈判极其困难的情形下，他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协助下，最终使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

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的自我牺牲精神上看。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蒋上演了一出“审、判、赦、囚”的政治戏，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被软禁长达近半个世纪。因此有人说张学良对蒋认识不清，政治上不成熟。实际上他对蒋介石将对他采取惩治是有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的，他也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备，但对被软禁半个多世纪是没想到的。他这样做是为了蒋介石的领袖威信，是为了蒋介石兑现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诺言。蒋介石兑现了诺言，作为“领导”全国抗日战争的“领袖”，而“名满天下”。张学良以他个人失去半个世纪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换来国内的和平和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他始终无怨无悔。

从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来看。西安事变使10年内战的局面停止了，使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愿望得以实现，一场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是从这里开始得到充分体现。西安事变使国共两大政党结束相互对抗，再次合作，共同领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并取得伟大胜利。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作用

和地位，确定了张学良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历史地位。

同张学良一样生于 1901 年，并高寿百年的世纪老人很多；但能像张学良那样曾多次影响一个大国的历史走向、又被软禁了近半个世纪具有丰富多彩人生的人，似乎只有他一人。

作 者

2001 年 10 月 27 日